



为迎接建党 90 周年,本报从本期起开辟《红色资本人物列传》专栏。无论是公私合营过程中资本家的爱国故事、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第一战的另类硝烟,还是中国工业企业先驱的奋斗情怀、改革风云中的央企巨擘……红色资本人物的传奇经历和奋发精神都跨越时代、历久弥新。

陈嘉庚的奇异旅程

■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1915 年的李铁民决计想不到 25 年之后的一次意外受伤会直接改变一次至关重要的旅程。
1890 年,17 岁的福建少年陈嘉庚跟随下南洋的人潮到了新加坡。1915 年,另一个 17 岁的福建少年也踏上了下南洋的旅程,他就是李铁民。
25 年之后,陈嘉庚和李铁民一同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启程

1940 年,身为华侨领袖的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实地考察抗战情况,这位少时白手起家、历经商海波澜的爱国商人,彼时未曾想到,他将路上的是一段奇异的旅程。之前担任过新加坡《叻报》总编辑的李铁民以南筹总会秘书的身份一路随行。

1940 年的陈嘉庚,早已是驰名海内的大实业家,他的实业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堪称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橡胶大王”。

在此之前的几年中,眼见国内抗战形势日益艰巨,远在异国他乡的陈嘉庚,组织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亲自担任主席,团结各埠华侨,激励爱国热情,募捐款项支援抗日。南洋华侨捐款对战时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

1940 年 3 月 15 日,南侨筹赈总会华侨回国慰问团正式出发,陈嘉庚任团长,李铁民任秘书,一行共四人,乘飞机抵达重庆。

出发前的憧憬和热情,很快消散。

在陈嘉庚眼前,战时的“首都”,一派虚华。政治的空气里充满了与抗日艰苦征战截然相反的气息。

蒋介石特意指拨的 8 万元接待经费,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豪华酒楼,身居要职的国民党官员生活奢华,街市灯红酒绿,达官贵人挥金如土。见此情景,陈嘉庚的心一天天往下沉。

陈嘉庚拒绝了蒋介石的奢侈应酬,他在重庆各报刊登启事,说明“慰劳团一切费用自理,不需消耗政府和民众财力”。

在重庆的日子里,陈嘉庚越来越失望。与此同时,来自国民政府蓄意挑拨的反面“宣传”,也让他对知之甚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有了强烈的好奇心。

站在陪都街头,陈嘉庚望着李铁民,两人似有默契,有了新的主意。他们打算为这次旅程找一个新的目的地。

延安。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名。陈嘉庚决意前往。他在一次和蒋介石共进午餐后坦言“延安通车亦欲前往”。一提延安,蒋介石便“有话要说”。在一如既往地“大骂”之后,蒋介石叮嘱陈嘉庚“千万不要受骗”。

然而,陈嘉庚去意已决。
5 月 26 日,陈嘉庚一行抵达西安。次日,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访见陈

嘉庚,并请他到第 18 集团军驻地西安办事处吃午饭。陈嘉庚慨然应允,但陕西省政府招待负责人寿家骏借故力阻其行。朱德只好改到下午 3 点,并说从延安经西安往重庆的周恩来也在此一同候见。陈嘉庚再次允诺。不想寿家骏有意将接待车驶往别处,拖延很晚方回。陈嘉庚十分恼火,但这更激发了他非见不可的决心。
5 月 30 日,陈嘉庚一行乘车由西安去延安,第 18 集团军办事处派车随行。临行时寿家骏忽然提出省政府已派他送陈嘉庚到延安,于是同行,实际他是奉命监视陈嘉庚。
车行途中至洛川,一伙有组织的

慎撞到了汽车门顶,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当即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治疗。

李铁民的受伤,改变了陈嘉庚的原定计划,原本只是短暂逗留的旅程,有了未知的变数。

当时为李铁民疗伤的是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连暲向陈嘉庚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陈嘉庚深受感动。

此后的几天里,李铁民住院疗伤,陈嘉庚则展开了真正的延安之旅。



陈嘉庚和毛泽东在一起

“民众”半道拦车,名义上是控告,实为诋毁延安,陈嘉庚和李铁民相视一笑,不为所动,继续前行。

奔赴

1940 年 5 月 31 日下午 5 时,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各界民众 5000 多人齐集城外,欢迎陈嘉庚的到来。陈嘉庚走下汽车,向欢迎人群鞠躬,挥手致意。在随后举行的欢迎会上,陈嘉庚动情地说:“我早就希望来延安访问,现在实现这一愿望我很高兴,广大华侨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共同抗战,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侨胞爱国之心,为祖国抗战多做贡献。”

6 月 1 日上午,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一行参观延安女子大学。李铁民惊喜地认出了一个叫廖冰的马来亚归国女侨生,正是女儿李芳娇的同班同学。异地重逢,分外欣喜,李铁民向陈嘉庚引荐认识,陈嘉庚向廖冰仔细询问了在延安的生活和所见所闻,并同在校的 20 多名华侨学生进行了交谈。从这些华侨学生的口中,陈嘉庚第一次真实地了解了延安。他和李铁民都感到了振奋和欣喜。

从学校出来后,李铁民上车时不

震撼

在朱德陪同下,陈嘉庚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陈嘉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个场景令他无比意外:一个穿着旧军衣的中年男人,站在窑洞门口——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住所。

虽然刚到延安的陈嘉庚已经初步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与众不同”,但是近距离接触到如此朴实的毛泽东,他还是感到了深深的震撼。之前,陈嘉庚无数次想象过与这位中共最高领导的会面,但这样的情景绝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窑洞里陈设简陋,陈嘉庚不禁联想起蒋介石府邸的豪华。相对于当日重庆的盛宴,陈嘉庚和毛泽东的第一次共宴,设于窑洞门前的空地上。没有高档圆桌,只有一张四张白纸当桌布的旧桌子,席间,一阵风吹来将白纸吹走,毛泽东索性弃之不用。饭菜仅有白菜、咸饭,惟一的荤菜是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俸有限,没钱没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虽无丰盛饭菜,但陈嘉庚吃得舒坦有味。那顿饭,陈嘉庚终生难忘。

相谈中,陈嘉庚坦诚地表示对两党的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诚挚地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此后的几天,陈嘉庚与毛泽东的多次见面。一些小事让陈嘉庚既惊讶不已又无限感慨。一次他和毛泽东谈话时,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走过来,不敬礼便坐下,并参加谈话,毫不拘束。一次,陈嘉庚在毛泽东办公室与之会谈,总司令部内的人都来参加,顷刻席间坐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塞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适些。陈嘉庚甚至亲眼见到这一幕:毛泽东烟瘾很重,有时烟刚抽一半,忽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遂将烟火熄灭,客人走后又将那半截烟蒂捺回吸完。

毛泽东平等待人、勤廉朴实、虚怀若谷,让陈嘉庚惊讶之余更是钦佩至极。

在延安,陈嘉庚除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交谈外,还亲自走上街头,实地观察。目之所及,朝气蓬勃的延安与腐朽虚华的国民党陪都截然不同。

希望

延安城外一里路,有一条百米长的小街,当地军民称它为“新市场”,是惟一的商业街。陈嘉庚专门前往观察。这里有百多家商铺,还有一家照相馆,土特产不少而工业品奇缺。陈嘉庚问一个店主:“政府有没有存货公卖?”答:“没有,都是我们自行经营的。”又问:“这里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资本?”答:“大商店很少,听说有 10 万和二十万的,大多是收买土产生意的。”与此同时,养伤的李铁民也和陈嘉庚一样被延安所折服。他甚至在住院期间向中共中央的工作人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月 7 日,李铁民伤愈出院,陈嘉庚也即将离开延安。当日,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陈嘉庚登台讲话,他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真正感受到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

陈嘉庚延安之行,实地了解到了延安之真相。在此之前,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而通过延安之行,他开始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断定“惟有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才有希望拯救中国”。

“我未住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陈嘉庚的这番话,为他历时 7 天的奇异旅程画上完美句号。



“上党银号”经理薄一波



薄一波在山西

■ 马铭/文

1938 年的夏天,30 岁的薄一波站在山顶,远远注视着森林掩映中的小村庄。他刚刚做了一个决定,将上党银号驻扎在这个地理位置既险要又隐蔽的村子里。

一年前的 8 月,“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正式成立,薄一波任抗战决死队政治委员兼总队长,这是山西第一支特殊形式的抗日武装。10 月,薄一波率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及山西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进驻沁太岳山区县,创建以沁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大岳区抗日根据地。

1938 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扼杀建立之初的晋冀鲁豫边区,不仅进行残酷的军事进攻,还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由于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在各县的交界区、游击区等偏僻落后的山区,又加之日军扫荡后留下的创伤,根据地民生凋敝,社会经济困难,市场上金属铸币被百姓储藏,原有的货币失去购买力,货币交易出现了以“小米”为计价单位的物物贸易,金融市场满目疮痍。

1938 年 4 月,在粉碎日寇第一次“九路围攻”晋东南行动后,为了支持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维持战时经济和统一财政管理,掌握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货币紊乱现象,抵制伪币的推行,保证抗日救国顺利进行,经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三专署、五专署共同商定,成立自己的银号,掌握自己的财政命脉。

同年 8 月,时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的薄一波在沁县郭村创设上党银号,经理由薄一波兼任,王鹤五、王干卿任主管。银号下设计股、发行股、总务股。并随即发行了壹角、贰角(两种图案)、伍角、壹元、伍元(两种图案)共五种面值的上党银号币(均由上党银号印刷厂印制),在晋东南三、五两专区市场上与省钞、法币同时流通使用,上党票与省钞比值为一比一。

当时,创办银号的基金近百万元。一部分是阎锡山给抗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于三专署财政拨款、各县士绅富商捐助和百姓捐助抗日政府。薄一波后来在《沁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回忆录中提到:“上党银号开始的资金,阎锡山不是给咱们点钱嘛,八路军不是也有点钱嘛,开始就是这个资金,资金也不大。”同时,银号也是初级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实地采访后写道:“银行的简便,会让西方的银行家们瞪目。”

当时的晋东南存在着各色各种的杂币,其中不仅有各种银行发行的钞票,而且数以千百计的杂货铺、当铺、饭馆等店铺出的期票也进入了流通领域。上党银号正是通过兑换逐步清理了杂币,使币制得到统一,也稳定了币价和物价。在兑换中,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人们也可以用上党票无限制地兑换法币,以方便群众,活跃经济。上党银号还提供低息借贷。通过此项业务,扶植群众生产,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和对工人进行救济。上党银号借贷利息一般为月息六厘,期限为两个月,比社会上的借贷利息低了一倍还多。上党银号通过报纸等宣传渠道,反复向群众宣传抵制伪钞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严禁伪钞在根据地流通,并广泛宣传辨认伪法币、伪省钞的方法,从而把伪钞逐步地排挤出流通领域,巩固了法币和省钞的地位。

上党银号在晋东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督之下发行了一定数量的流通纸币,即上党票。上党票的发行,其最大的特点是发行数额大,人民有了自己的主币。上党票在根据地流通使用的范围广,占领了 68% 的日伪“联合票”货币市场。上党银号在统一战线形式下,财政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八路军手中,是完全独立的金融货币机构。资金的使用直接服务于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和抗日军队。

上党票的发行,使敌人不能再用伪钞通过正常的商业流通形态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一升米、一担菜,这是对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企图的一个极大打击,有效保护了人民的劳动成果。

上党票的流通范围,最初是在三、五行政区境内(即太行、太岳地区),后来随着抗日民主政权威信的提高,上党票流入了敌占区。1940 年初,上党银号结束,其财产并入冀南银行时上党票共发行近 400 万元。

让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是银号的生存状态。战争时期,战斗十分频繁和激烈,业务人员是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随部队与敌人周旋。特别是会计和出纳更要具有坚定的决心和不畏牺牲的精神,千方百计,采取各种途径,保证账款的安全,做到“人在款在,款在账在。”储备金的黄金、白银、银元等财宝,都要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里。埋藏时,只有银行经理、出纳和一名党员知道所藏之处,并且根据当时环境只能将埋藏地默记在心里。

薄一波领导的上党银号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为掌握和发展太岳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支持边区政府活跃抗日根据地经济和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随着冀南银行成立,以掌握根据地财政、活跃金融,抵制、打击伪币,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支援抗战为己任的上党银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多年后,当年的上党银号经理薄一波成为解放后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

背景

硝烟战火中的红色资本

■ 齐雯/文

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从来都和经济发展紧密关联。

早在红军时期,瑞金红色根据地就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组织了农业生产和少量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1928 年 4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日益困难的部队给养和行政开支,他们在上井村创办了首家红军造币厂,出炉了红色政权首批金属货币,并取“工农苏维埃”之意,在币面隐蔽位置加凿了一个“工”字标记,因而被称为“工字银元”。紧接着,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成功地开印了苏区第一张纸质货币铜元票,为红色政权货币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中央苏区“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的工农

商业受到很大的损伤,影响了财政收入。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根据地军民克服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和抗日战场军事格局的变化,因地制宜制定了军事经济工作方针和政策,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灵活有效的军事经济工作,加强财政金融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军事工业生产,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如著名的南泥湾开荒;繁荣对外贸易和进行对敌货币斗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军事经济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解放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部队除了进行生产自给和掩护农

晋察冀根据地部队,每在农忙季节,都以 1/2 的劳动力帮助农民生产,帮助贫苦农民解决了不少困难。除军队外,民兵也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劳动力和武力相结合,战斗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一手拿钢枪,一手拿锄头,创造了许多既便于生产又便于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积极发展根据地对外贸易,努力增强军需物资的供给能力。

“皖南事变”以前,各根据地对外贸易部门大都是采办性质,主要从根据地外面采购物品,保障军民物资需要。在很大程度增强了对抗日战场军需物资的供给能力,为我敌后根据地度过抗日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在抗日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开展军事经济工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自己动手、丰